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路构建与实践探析

曹胜亮 魏秋然

摘要:大学生作为高势能知识资本的代表参与乡村治理已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通过治理主体、治理信息与治理技术三层通道,实现了从“被动受教”向“主动赋能”的逻辑嬗变,并在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促进政策落地、推动数字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该群体仍面临标准化知识与乡土情境的断裂、社会嵌入受阻、激励不相容导致流动性大以及区域资源错配等多维困境。为此,需从高校人才培养范式转型、乡村社会包容性重构、政府制度供给改进以及学生个体能力提升等,来推动大学生由乡村治理的“外来参与者”转变为“内生建设者”,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关键词:大学生;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2-0056-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到要“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2]。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乡村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乡村长期浸润于“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的文化肌理中,改革开放后一度又面临治理效能的欠佳。在城乡加速融合的今天,又面临着与现代治理规则衔接不畅、应对复杂公共事务能力不足的挑战。同时,乡村治理主体“空心化、老龄化”的现实,与“数字乡村”战略下乡村治理正从传统的“乡政村治”向精细化、数字化、法治化的现代治理体系迈进相矛盾。在此背景下,大学生作为新时代具备现代知识结构与数字素养的青年人才,其返乡参与治理不仅是缓解基层“人才饥渴”的应急之举,更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学界围绕大学生参与乡村

治理的动力机制、实践效果、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进行了大量探讨。在动力机制方面,基层治理的“行政化、数字化”趋势迫使乡村两级急需引入大学生以弥补中老年干部所面临的能力短板困境^[3],且体制内的稳定预期与服务群众的效能感构成了大学生返乡的核心动力^[4]。在实践效果方面,大学生的参与为乡村注入了新鲜血液^[5],显著提升了村庄治理的“服务供给”水平^[6]。在现实困境方面,受限于经验匮乏与地缘疏离,大学生在推动深层次的“村民自治”与“集体增收”方面仍显乏力^[7],且存在“了解不深、参与不足”及人才流失风险^[8]。在路径优化方面,需通过专业化能力提升以应对行政任务的下沉要求^[9],并依靠党建引领来破解转型期的治理梗阻^[10]。

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政策评估或单一视角的动因分析,较少从“新时代治理技术变革”与“传统村庄社会结构”互动的微观机制层面,探讨大学生究

收稿日期:2025-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提升研究”(23BDJ013)。

作者简介:曹胜亮,男,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205)。魏秋然,男,通讯作者,武汉工程大学党建与社会治理中心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205)。

竟“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本文拟围绕“新时代大学生在村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这一命题,构建一个集要素供给与效能转化于一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视大学生为连接国家治理体系与乡土社会的关键“转换器”,指出其治理效能的发挥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简单填充,更取决于能否打破“悬浮化”困境,在“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的张力中实现“能力嵌入”与“结构耦合”的深度互构。同时,全文将以此逻辑为主线,深入剖析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路、实践途径、结构性阻滞与优化路径。

一、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路构建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是突破历史传统的时代重塑之举,是联结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这一过程的有序实现需要通过主体重塑、信息整合、技术重构,调试治理要件,以重新分配契合于乡土社会的现代治理要素。

(一)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本质意涵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本质上是重构城乡关系与参与逻辑后,高势能知识资本向乡村社会的流动。首先,它是新时代城乡关系与治理结构的深刻重塑。这一进程体现了国家战略需求与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耦合。大学生作为承载现代法治理念与数字技术的青年群体,既能有效填补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技能赤字”与“现代性短板”,又是缓解城市结构性就业矛盾、优化国家人才空间布局的关键变量。其次,与历史上基于行政主导和政治动员的“知青下乡”不同,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受教”向“主动赋能”的逻辑嬗变。它超越了单向度的外部植入与“悬浮”困境,转而呈现出“双向共生”的全新特征,即大学生不再仅是“被教育者”,而是连接城乡的“中介节点”和“建设者”。其通过嵌入式治理将现代要素引入乡土社会,在法理与情理的融合中达成个体价值实现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双重共赢。总而言之,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现代要素、异质性文化内核、新技术的综合载体,表征为高势能知识资本形态,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二)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信息—技术”通道构建

高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明晰“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在此基础上,可以多主体的协同嵌入与文化

逻辑调试、知识的高效生产与传播、技术的合理引入与主动赋能为手段,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通道。

1. 治理主体:多元协同与文化调适

协同治理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为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互动和决策,并分别对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的过程^[11]。从乡村治理来看,其亦是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良性互动的过程,而大学生的参与本质上是对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与对各类型文化逻辑的调适。

第一,在多元协同层面,“政府—大学生—村集体组织—社会组织”多元主体互动关系的引入。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承担着制度供给、政策引导的核心职责;村集体组织是乡土社会的核心载体,承载着联结村民、凝聚共识的关键作用;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补充,能够弥补政府与村集体的服务短板;而大学生通过国家政策引导与个体自主实践途径,居于不同属性的社会网络结构洞位置,作为多元主体间的“桥梁纽带”,凭借其知识优势与中立性特征,推动多元主体打破沟通壁垒,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治理效能的协同提升。

第二,在文化调适层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科层文化(国家逻辑)与乡土文化(乡土逻辑)间的双向调适。国家逻辑以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强调治理的统一性与高效性;乡土逻辑则植根于“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凸显人情伦理、协商共识的价值。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正是推动两种逻辑良性碰撞、有机融合的过程,既将国家科层文化中的法治理念、规则意识引入乡土社会,破解乡土治理中的复杂化、零碎化困境,又尊重乡土文化的本真性,引导国家政策与乡土情理精准衔接,避免治理的“悬浮化”,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协同与文化双向重塑的双重目标。

2. 治理信息:知识生产与传播整合

知识是凝练的信息,需要大学生这一高势能知识资本承载者,将无直接关系或者关系间断的行动者联结起来,并在行动者之间搭建生产知识、传递信息与资源的桥梁^[12]。

第一,在知识生产层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可实现村域内外知识的融合生产。大学生依托其专业知识储备与现代思维方式,立足乡村治理实际需求,参与乡村发展规划、公共服务优化、矛盾纠纷化解等具体事务,将抽象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治理方案,本质上是一种针对性的知识生产过程,

能够有效填补乡村治理中的“知识赤字”与“信息鸿沟”,为乡村治理提供知识保障。

第二,在信息传播层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可实现多元协同主体横向间、国家社会纵向间的高效信息传播。一方面,大学生作为乡村与外界连接的重要节点,搭建起城乡信息流通的桥梁,打破乡村信息封闭的困境;同时,从结构洞视角来看,大学生能够占据乡村治理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洞位置,整合政府、村集体、社会组织、村民等不同主体的信息资源,推动治理信息在多元主体间高效流通、精准传递。另一方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村民及时了解国家政策、乡村发展动态,也能让政府与相关部门精准掌握乡村实际需求,实现治理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信息支撑。

3. 治理技术:引入调整与赋能重构

现代数字技术的引入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新机^[13]。而大学生作为现代技术的熟练应用者与传播者,成为乡村治理技术引入与赋能重构的核心载体,深刻改变着乡村既有技术体系与治理模式。

第一,在技术引入层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可实现治理技术的适应性调整。大学生凭借其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结合乡村治理实际,积极引入或推介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如数字政务、智慧养老、智慧农业、线上矛盾调解等技术手段,丰富乡村治理的技术载体,推动乡村治理从“传统经验型”向“现代技术型”转型。这种技术引入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结合乡村实际需求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确保引入的技术能够贴合村民生活习惯、契合乡村发展水平,具备较强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在技术赋能层面,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可重构治理技术赋能过程。大学生通过开展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方式,帮助乡村干部与村民提升技术应用能力,推动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治理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重构既有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这种赋能重构不仅能够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与质量,如通过数字政务简化办事流程、节省办事成本,通过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还能推动乡村治理结构优化,打破传统治理中的层级壁垒,促进治理权力下沉,增强村民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实现技术赋能与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机统一,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二、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途径与现实成效

当前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已形成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制度化嵌入”与高校、个人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参与”并行的格局,这种双轨并行的机制不仅优化了乡村治理结构,更在提升基层服务效能、推动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途径

“国家政策引导”与“个体自主实践”在组织形式与运行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角色地位不同,但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嵌入乡村治理的完整图谱。

第一,国家政策引导是“主渠道”与“硬支撑”。其必要性体现在乡村治理面临着结构性的“人才空心化”难题,必须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统筹与制度化的资源配置,才能保障基层治理队伍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同时,其合理性体现在该路径具有极强的组织性与规范性,作为一种“制度化嵌入”,它侧重于行政职能的履行与国家意志的在场,能够确保大学生人才精准输送到乡村最急需的岗位上。具体而言,这一路径主要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选调生制度与基层公务员招录五种核心形式落地,其具体内容、形式内核与政策依据参见表1。

第二,个体自主实践是“生力军”与“柔性补充”。其必要性在于弥补了行政管理灵活性与创新性上的不足,能够针对乡村具体微观问题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其合理性则在于充分尊重了大学生的主体意愿与专业特长,通过“高校组织”与“市场机制”的双重赋能,激发了大学生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在实践形态上,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基于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各类公益支教及乡村调研活动。大学生以项目团队的形式短期“嵌入”乡村,开展法律普及、文化下乡或关爱留守儿童等服务。二是基于市场机制的返乡创业与技术服务。一方面,大学生利用电商直播、文旅策划等专业技能返乡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动村民致富、重塑乡村公共精神,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的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之中。

第三,国家政策引导与个体自主实践的差异性分析。一是治理侧重的差异性。前者是“自上而

下”的行政安排,强调职责明确与长期驻守,解决的是“基础性”的治理缺位;后者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强调专业匹配与灵活服务,满足的是“发展性”与“精细化”的治理需求。二是治理逻辑的差异性。前者动力源自国家战略意志,通过科层制的组织体系进行资源调配与人员选拔,具有极强的契约

性,体现为一种“刚性嵌入”,保障了治理力量供给的稳定性。后者动力源自大学生的乡土情怀、专业兴趣或市场机遇,依托的是高校团委、社会组织或市场主体的平台,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体现为一种“柔性介入”,可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

表1 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国家政策引导”途径

具体形式	具体内容	形式内核	政策文件
大学生村官计划	通过选聘大学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使其直接深度参与村务决策、政策落地及矛盾调解,发挥基层组织的“毛细血管”作用	嵌入村级权力核心,将现代科层理性引入传统人情社会。在深度参与决策与调解中,通过规范议事程序与运用法治思维,有效提升基层组织的政治引领力与矛盾化解能力	《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
“三支一扶”计划	重点选派人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及乡村振兴工作,旨在从教育质量改善、农业技术推广及医疗服务强化等多维度解决乡村发展的民生痛点	实现专业技术资本的精准“能力嵌入”,解决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缺位”痛点,将数字化与项目化管理思维注入重点任务,推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向“专业化”与“精细化”跨越	《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21号)
西部计划	面向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志愿者身份引导大学生投身基层青年工作与社会管理,填补区域发展的人才洼地	侧重于欠发达地区社会治理的“柔性润滑”。通过引入现代文明理念与志愿服务精神,重塑乡村封闭的文化生态,培育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契约精神,以低成本的社会化手段提升边远地区的社会治理效能	《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青联发〔2023〕6号)
选调生	作为党政后备人才的培养摇篮,选派优秀毕业生到乡镇或村任职锻炼,直接参与乡村规划与重点项目推进,在积累基层治理经验的同时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	充当“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转换的关键枢纽。凭借宏观政策视野与资源链接能力,优化乡村规划与项目配置,避免治理的碎片化与短视化;同时,通过规范化行政运作示范,带动村干部管理意识升级,强化基层治理的执行力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组通字〔2018〕17号)
基层公务员招录	吸纳大学生进入乡镇机关的乡村振兴岗或民生服务岗,通过履行行政职责推动涉农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落地 ^[14]	利用法治思维与数字素养,推动涉农事务办理的标准化与透明化,有效规避基层治理中的随意性,从体制内部夯实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基础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注:表格由作者整理所得,其中政策文件详细内容参见注释①。

(二)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成效

新时代大学生在村在改变传统乡村治理的结构和运行逻辑的同时,推动了乡村治理从“硬治理”向“软治理”转型,其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优化主体结构、消弭政策壁垒与重塑技术底座三个维度。

1. 优化队伍结构,纾解基层“人才空心化”与传统治理困局

乡村社会面临着精英外流导致的“空心化”与留守干部老龄化带来的“传统治理”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第一,大学生在村可实现基层主体内的“精英循环”与“结构换血”。大学生作为拥有现代知识体系的新生代力量,有效填补了基层治理主体的代际断层。通过国家政策引导的选调生、大学生村官计划等机制,高素质青年人才被精准输送至关键岗位,打破了传统宗族社会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封闭式用人逻辑,构建起“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显著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现代化行政能力与政治吸纳能力^[15]。第二,大学生在村重塑了基层治

理的“能力图谱”。不同于传统村干部的经验主义治理,大学生带来了法治思维、契约精神与专业技能,推动了乡村治理从单一的行政命令转向“法治+德治+自治”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总之,这种主体结构的优化,本质上建设了可激活内生动力的治理共同体。

2. 畅通政策落地,消弭惠民“最后一公里”的信息不对称

大学生凭借其跨文化的理解力与沟通力,在国家意志与乡土逻辑之间扮演了关键的“转换器”与“润滑剂”角色,有效解决了政策执行中的“三难”困境。一是针对“解读难”,大学生发挥“文化翻译”功能,将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乡土社会的“大白话”,降低了村民理解政策的认知门槛,使法治精神与惠民政策真正入脑入心;二是针对“传递难”,大学生利用新媒体矩阵构建起扁平化的信息传播网络,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会口口相传的信息茧房与失真风险,确保了政策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性;三是针

对“办理难”,大学生提供了精准的“代办服务”与“流程再造”,填补了留守群体在数字化时代的技能鸿沟。总之,这种“通俗化阐释+全媒体传播+保姆式服务”的闭环模式,将国家政策的“制度优势”高效转化为村民可感可及的“治理效能”,显著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公信力与向心力。

3.引入数字工具,跨越“数字鸿沟”,推动乡村“智治”转型

在大数据时代,大学生利用专业技术优势,成为乡村“数字赋能”的核心引擎,推动基层治理的“智治”转型。第一,大学生是决策科学性的“促进者”。他们通过引入可视化管理系统、搭建便民服务小程序等举措,实现了村务数据的云端化与治理过程的可追溯化,改变了基层数据滞后、档案管理混乱的现状,较好提升了行政效率与决策科学性^[16]。第二,大学生是数字能力的“构建者”。在技术下乡的过程中,通过“手把手”的教学与培训,提升了村干部与村民的数字素养,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总之,“技术嵌入+能力培育”推动了乡村治理的流程再造,使数字技术成为真正嵌入治理肌理的工具,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

三、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结构性阻滞

在“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遭遇着结构性阻滞,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治理层面的深层投射,主要表现为能力适配、社会嵌入、激励机制及区域差异等维度的困境。

(一)能力适配困境:标准化知识与非标化情境的“认识论断裂”

能力适配的矛盾,本质上是高校教育体系产出的“显性知识”与乡村治理所需的地方性“默会知识”之间的断裂^[17]。第一,存在学科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错位。现代高等教育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逻辑,侧重于标准化、理论化知识的传授。然而,乡村治理场景具有综合性与模糊性,急需的是农业技术推广、乡土矛盾调解等“非标准化”技能。例如,在实践中,常出现精通现代金融理论的大学生面对田间地头的农作物病虫害束手无策,这种“知识悬浮”现象使得高阶理论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治理工具。第二,存在治理工具与乡土逻辑的排斥。乡村社会积累了一套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而大多数城市背景的大学生习惯以科层制的“普遍主义”原则

处理事务。典型表现为在处理邻里矛盾时,部分大学生机械地引用刚性法律条文,却忽视了宗族情面与历史渊源,这种“合法但不合情”的处理方式不仅无法定纷止争,反而容易激化矛盾。

(二)融入融合困境:“差序格局”下的信任壁垒与排斥

融入融合困境的核心在于大学生作为“外来行动者”难以有效嵌入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第一,从社会结构来看,乡村社会依然遵循“差序格局”,信任建立在血缘与地缘的长期互动之上。大学生缺乏这种先赋性的社会资本,面临着多重“隐性社会排斥”。例如,部分大学生因听不懂方言而被村民贴上“局外人”标签;常因不知晓户与户之间的历史恩怨而在工作中“说错话”、表错态,导致被排除在核心信息圈与决策圈之外。第二,“返乡青年”与“进乡青年”面临着身份合法性的显著差异。“返乡青年”凭借家庭背景的“知根知底”,更容易被纳入“自己人”范畴从而获得情感性信任;而异地安置的“进乡青年”即便努力掌握了方言,也往往难以打破“外来干部”的认知壁垒,其信任基础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极难转化为人际层面的特殊信任,导致其在治理实践中长期处于“悬浮”状态,面临“此乡非吾乡”的深层疏离感。

(三)留存激励困境:理性选择与激励不相容的“候鸟式”流动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审视,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短期化”与“工具化”特征,其根源在于激励机制的扭曲与机会成本的考量。第一,物质激励与人力资本投入失衡。大学生作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在基层岗位获得的经济回报往往远低于市场预期。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志愿者或大学生村官的月度补贴仅能勉强覆盖基本生活开支,与城市就业的薪资水平形成巨大落差,加之艰苦的生活条件,构成了巨大的离职推力^[18]。第二,职业发展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过客心态”。由于基层服务期满后的晋升通道狭窄,体制内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大学生将基层岗位视为考公、考研的“黄金跳板”或就业缓冲期的“避风港”。这种“候鸟式”的频繁流动导致乡村治理陷入“年年派人年年新”的循环,政策执行缺乏连续性,治理效能不佳。

(四)区域差异困境: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马太效应”

我国乡村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导致大学生参与治理的效能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形成了“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一困境本质上是外部治理资源与在地资源禀赋的耦合协调问题。在东部沿海或城郊融合类村庄,得益于完善的物流网络与产业基础,大学生能够充分利用专业技能(电商直播、规划设计)迅速打开局面,实现个人价值。在西部偏远山区或深度贫困村,受制于地形破碎、网络信号不稳定及物流成本高企,同样的创业项目或数字化治理构想往往难以落地。大学生在此类地区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既缺乏可运营的集体资产,也缺乏施展才华的基础设施。这种资源约束不仅削弱了治理成效,更加剧了人才的逆向流失,使得最需要人才的欠发达地区反而最难留住人才。

四、新时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大学生群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结构性张力,必须基于“结构—功能”视角,从高校人才供给、乡村社会吸纳、政府制度激励以及个体能力等维度进行重塑,构建全链条的系统性支持体系。

(一) 高校侧:从“学科逻辑”向“实践逻辑”转型的培养范式重构

高校亟须开展知识体系、课程设置与教学范式的全方位改革,实现“学科逻辑”向“实践逻辑”转型。

第一,构建“通识+专业+乡土”的复合知识谱系,重塑契合治理需求的知识供给结构。作为人才供给侧,高校的培养模式需建立与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相耦合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体系。针对治理实践中显现的知识结构性短板,通过构建复合知识谱系,推行跨学科的知识供给模式,确保学生既具备扎实的专业底色,又拥有广博的乡土视野。

第二,增设乡土情境课程模块,着力提升大学生的乡土文化解码能力。有条件的高校在强化公共管理、社会学等专业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引入“乡土知识”模块,通过增设乡村社会学、农村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与民俗文化等课程,弥补学生对乡土社会礼俗规则的认知盲区。这种课程设置旨在培养学生兼具现代法治理念与乡土情理认知的双重知识结构,使其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能够“入乡随俗”且“知行合一”。

第三,革新实践教学,逐步建立“全周期、沉浸

式”的育人机制。高校应改革实践教学范式,推动从“旁观式体验”向“参与式行动”转变。建立校地深度融合的治理实验区,推行长周期的驻村实习制度,通过“双导师制”(校内学术导师+校外实务导师)引导学生深度介入矛盾调解等真实治理场景。这种沉浸式机制旨在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帮助学生在具体的治理情境中完成理论知识的在地化。

(二) 乡村侧:优化社会生态与促进治理主体的“有机嵌入”

只有乡村社会从心理、组织与文化层面真正接纳这一新兴群体,大学生才能实现从“物理在场”到“社会嵌入”的实质性跨越。

第一,重构开放包容的乡村社会生态,为大学生的“社会嵌入”提供合法支持。乡村社会的封闭性是阻滞外来人才发挥作用的关键变量。需致力于优化乡村社会生态,搭建有效的社会资本转接机制,消解信任壁垒。面对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要通过制度化安排辅助大学生消除信任赤字,使其获得村民的心理认同与社会接纳。

第二,乡村组织应建立社会资本的“传帮带”机制。可以由村两委干部或宗族长辈担任“乡土引路人”,通过赋予大学生在公共事务中的适切角色,帮助其快速理清村庄内部的利益关联与宗族脉络。通过以上“权威背书”与“关系引荐”,加速大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身份转化,降低其介入村庄事务的交易成本。同时推动“双轨治理”融合,降低文化摩擦。

第三,推动“双轨治理”深度融合,构建国家法理与乡土情理相协调的对话平台。为避免大学生因过度依赖科层制手段而导致的治理僵局,村级组织应搭建法治与德治的对话平台,更好支持大学生将现代契约精神、法治思维与村规民约、公序良俗有机结合,在尊重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引入现代治理规范。这种融合策略有助于消解文化冲突,提升治理措施在村民中的可接受度与执行力。

(三) 政府侧:强化制度供给与资源配置的“激励相容”

政府需通过明晰权责边界、优化创业生态及完善保障体系,构建一套“进得来、干得好、流得动”的制度闭环,以政策红利对冲基层工作的艰苦性与复杂性。

第一,厘清权责边界与治理角色,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个人发展与公共治理的“激励相容”。要清晰界定权责边界,确立在村大学生治理主体地位。针

对基层实践中存在的角色模糊与“打杂化”现象,政府应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权责清单。清晰界定大学生在村级决策咨询、公共服务供给、集体经济运营等方面的法定权限与具体责任,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治理空间,使其在公共事务中既有为又有位。

第二,强化顶层设计与全链条扶持,多措并举优化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政策生态。政府要精心进行顶层设计,积极输送政策,高度重视政策的系统性、衔接性和可操作性^[19]。面对乡村创业环境的复杂性与高风险性,政府不仅要做好宏观层面的顶层把控,将大学生创业计划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战略布局中,结合地方产业特色进行差异化引导;更要致力于优化微观层面的政策供给,构建涵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信贷、用地保障及技能培训在内的“全链条”扶持体系。

第三,完善多元投入与长效保障机制,以显性制度红利对冲基层工作的艰苦性。为应对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人才虹吸效应,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动态调整机制与职业发展通道。一方面应综合考虑偏远地区的艰苦程度与机会成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完善岗位津贴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应打通基层服务经历与职业晋升的制度接口,将治理绩效作为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及研究生升学的重要评价指标。通过这些显性的制度红利,对冲基层工作的艰苦性,维持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四) 学生侧:提升基于“反思性实践”的适应性治理能力

大学生必须在具体的田野实践中完成认知的跃迁与能力的重构,通过强化适应力、调研力与资源链接力,将自身的智力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效能。

第一,强化主观能动性与适应力,完成从“书本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认知跃迁。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适应力是激活基层活力的内生引擎。一方面,要克服“悬浮”于乡土之上的知识优越感,强化对“地方性知识”的习得与尊重,意识到乡村并非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客体;另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村庄在资源禀赋与社会结构(如宗族关系、人口结构)上存在的显著异质性。唯有建立起对具体乡土情境的敏锐感知,将抽象的专业知识与具体的乡土底色相结合,才能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破局”的转变。

第二,摒弃“本本主义”思维定势,通过扎实调

研开展情境化的治理创新。一方面,要坚持深度的田野调查,精准解码服务地的核心特征与村民的真实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作为“翻译者”与“转化器”的中介功能,将国家宏大的战略目标与治理话语,拆解为村民“听得懂、愿意看、能参与”的具体实事,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通过这种治理策略,有效消除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摩擦成本,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有效性。

第三,提升资源链接与结构洞跨越能力,发挥城乡要素流动的“中介”优势。大学生应充分利用自身处于城乡交汇点的独特位势,利用结构洞位置打破信息不对称。主动链接高校智库、校友网络、社会组织及互联网平台资源,将外部的技术、资金、市场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通过这种“资源导入型”参与,不仅能弥补乡村发展的要素短板,也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实现个人价值与乡村振兴的共赢。

结 语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大学生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绝非缓解基层人才匮乏的权宜之计,而是连接“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推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治理转型的战略选择。受城乡二元结构及治理环境复杂性的深层制约,这一进程目前仍面临着能力适配层面的“认识论断裂”、社会嵌入过程中的“信任壁垒”、激励机制扭曲下的“候鸟式流动”以及区域资源差异引发的“马太效应”等瓶颈。为此,必须超越单一维度的修补,构建涵盖高校教育供给侧改革、乡村社会包容性接纳、政府制度保障优化及个体能动性激发的系统性优化策略,以实现人才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

关于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是加强纵向的追踪研究。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大学生在基层服务期满后的职业发展轨迹,探究影响其“留任”或“流失”的长期机制。二是细化差异性的比较研究。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如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不同类型村庄(如城郊融合型与传统农区型)的治理场景,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分类介入模式。三是关注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变量。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如何重塑大学生参与治理的权力结构与互动形态,以及技术赋能是否能够有效弥补在地社会资本的缺失。这将为真正破解“引人难、留人难、用人难”的现实瓶颈,为乡村善治

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注释

①《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nr/zcfg/gfxwj/jy/202011/t20201111_396113.html, 2009年4月22日;《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21号),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5/content_7025914.htm, 2025年5月26日;《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青联发〔2023〕6号),中国共青团官网, https://www.gqt.org.cn/xxgk/tngz_gfxwj/gfxwj/202304/t20230420_791801.htm, 2023年4月13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组通字〔2018〕17号),湖北人事考试网, http://rst.hubei.gov.cn/hbrskw/zplks/jglyks/hbsxtks/zkgg/202601/t20260112_5853031.shtml, 2026年1月12日;《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2021年2月23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3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5-02-24(1).
- [3] 夏中幅. 大学生缘何参与治村: 基层行政化与个体的内在驱动[J]. 青年探索, 2023(2): 28-37.
- [4] 黄思. 农村大学生返乡进体制的动力与效能分析: 基于贵州省 G 镇青年干部的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2): 22-28.
- [5] 吴超. 论乡村振兴中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重要作用[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6): 22+61.
- [6] 崔宝玉, 肖瑶. 大学生村官能改善中国乡村治理吗? ——来自

- CRHPS2017 的微观证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76-87.
- [7] 王正攀. 由分化到平衡: 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治理人才发展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探索, 2024(3): 95-110.
- [8] 吴桂翎, 余厚石, 时伟, 等. 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意涵与路向[J]. 江苏高教, 2023(6): 66-71.
- [9] 赵晓峰, 高子畅. 国家治理转型与中国乡村三元治理结构形塑[J]. 探索与争鸣, 2025(9): 60-73.
- [10] 宋庆森.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价值意蕴、现实梗阻与路径优化[J]. 理论探讨, 2025(6): 34-42.
- [11] 田培杰. 协同治理概念考辨[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24-140.
- [12] 伯特·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M]. 任敏, 李璐, 林虹,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28, 30, 40, 81, 82.
- [13] 王亚华, 李星光.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8): 132-144.
- [14] 陈家建, 巩阅璋. 大学生村官政策成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基层治理调查的数据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75-184.
- [15] 边琳丽, 刘泽惠. 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 2019(27): 72-73.
- [16] 甘霖, 刘欣彤. 新时代乡村振兴视域下辽宁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探析[J]. 农业经济, 2025(7): 125-128.
- [17]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M].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96.
- [18] 任天驰, 杨晓慧, 康丕菊. “大学生村官”如何服务乡村振兴? ——基于第三次农业普查 10700 个村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11): 52-59.
- [19] 金秋实, 邓超楠. 乡村振兴视域中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时代困境与现实出路[J]. 农业经济, 2024(12): 113-115.

Exploring the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ao Shengliang Wei Qiuran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s of high-potential intellectual capital,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a pivotal force in elevating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is realized through three channels: governance subjects,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his process has achieved a 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empowerment”, yielding remarkable results in optimiz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facilit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advancing digital governance. However, restricted by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college students still face multi-dimensional predicaments, includ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tandardized knowledge and local contexts, impeded social embedding, high turnover rates caused by 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 and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regional resource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adv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aradig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inclusiveness,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These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transform college students from “external participants” into “endogenous builders” of rural governance, thus providing sustainable talent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r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农夫